

家庭調適的質量對話*

劉惠琴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本研究以量性設計及質性設計二種研究程序共同探討本地的青少年與其家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大環境的挑戰而調適的現象。研究對象主要以晚期青少年家庭為主。本研究樣本分為三階段蒐集，第一階段為大樣本的大學生班級團體。第二階段的研究樣本則是以研究者過去在親子個體化研究的樣本群中，徵求青少年家庭參與焦點團體的研究。第三階段則徵求有意願的焦點團體成員及其家人進行家庭訪問資料的蒐集。研究結果則分別(1)以簡單相關分析方法探討家人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差異與共識。(2)以簡單相關及 t 檢定法探討大學生受試者對其家庭系統知覺的連續性與變化性。(3)以 Q 因素分析描繪家庭動力之變化。及(4)以質性敘說分析方法探討相關家人對家庭調適行動的詮釋、理解，與行動意向。從量性研究結果來看，同一家庭內的不同家人間對其家庭系統的知覺是有差異的。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們對家庭系統的知覺與母親及與手足的知覺有較高的關聯，與父親的知覺則無關聯。整體而言，家庭共識與青少年家庭知覺呈現中度的正關聯，而家庭差異則呈現中度的負相關，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們只有 1/3 自覺到其家庭系統會因時間而有所變化。從質性研究的結果來看，本文以分別面對不同環境變化的三個家庭為例，說明家庭如何面對環境變化的調適與轉化過程。最後，作者則提出對於家庭調適之不同探究方式的討論。

關鍵詞：家庭系統、家庭調適

研究者長期以來關注台灣社會下家人的關係如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的轉化歷程。「家庭」在長期公/私領域的區隔下，被界定為私領域，以致低估了其在實際生活中受到社會大環境的激盪。家庭內的小系統與大環境中的大系統之間，其實是互為激盪的。研究者在三年前開始嘗試以「家庭」為探究的單位，而不是以「關係」為探究的單位，是因為「關係」必須放在家庭的整體系統中來看，而不同社會處境下的家庭系統亦會有所不同。更何況，身處不同社會處境中的人對「系統」的詮釋亦會有所不同。過去，主流的家庭系統理論致力於找出某些特定客觀的詮釋，以解釋大多數「正常家庭」的動力。然而，這樣的努力也往往忽略了家庭的變動性與多樣性。傳統心理學的研究典範，強調客觀、量化、直線因果等標準，使得研究取向集中在個人變項上，而不願面

* 本研究經費來源來自國科會補助(計劃編號：NSC92-2413-H-031-004)
通訊方式：jeanliu@scu.edu.tw。

對「有機體」「家庭互動」的事實；相對的，實務工作者面對的是問題能否有效改變，系統論對於深層結構的理解，有助於互動型態的深層改變。因此，系統觀點對實務工作者而言，或許不是什麼「新興」的觀點；但對於心理學的「研究」工作者而言，或許才稱得上是「新興」的領域。甚至，系統論觀點從最早完形學派的研究典範開始，即已存在，實在不是什麼「新興」的領域，而是在邏輯實徵的科學典範盛行之下，系統觀取向的研究較難符合客觀、量化與直線因果等判準而式微而已。事實上，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分野，也是受此科學研究典範所支配著，而呈現出學術界不與實務接觸，實務界研究與實務分裂等現象。近年來，由於多元研究典範的提倡，才開始在研究領域裡，有了些許鬆動的空間而已。家庭系統的思維與實徵測量之間一直存在著知識典範上的矛盾。循此脈絡，研究者認為，系統觀點的精神，無論在研究上，或在實務上，並沒有不同，不同的只是在於此理想目標如何在各領域不同的研究典範中尋求最貼切的發展空間而已。Markman (1992) 回顧了他過去十五年來在婚姻與家庭領域內的研究提出一些該繼續探究的重要議題，包括如何面對縱貫性研究的挑戰，如何加強觀察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如何加強婚姻／家庭研究的脈絡性，及如何加強婚姻／家庭研究的多元文化觀點等。Kazak (1992) 認為傳統探討家庭壓力 (family stress) 的觀點，主要視「壓力」為負面的變化，而不是視「變化」(change) 為一個過程，而這過程中會帶來程度不等的壓力。所以，關鍵在於「變化過程」的釐清。Kazak 除了釐清不同性質的變化，如發展性與非發展性 (developmental and non-developmental)，自願性與非自願性 (voluntary and non-voluntary)，積極性與消極性 (positive and negative)，累積性與暫時性 (long-term and short-term) 等不同性質的變化外，還特別提醒在研究策略上要以「家庭」為單位，包括有家中個人層次 (an individual level) 的資料，家庭互動層次 (a family interaction level) 的資料，及家庭與外界互動 (a level of interactions outside the family) 的資料。另外，家中不同的家人面對「家庭變化」的意義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全家人可能同時面對「客觀」的父母離婚事件，但不同立場的「父」、「母」、「子／女」針對此事件，會有不同的詮釋意義與壓力，而使得家庭變化的動力過程比想像中要複雜許多。

當然，要能面對上述學者們的研究提醒，並不是容易的事。本文嘗試分別從客觀的家庭系統測量及家人的主觀詮釋角度共同探究家人間是怎麼樣看待「家庭」這個單位，而最重要的是，「家庭」又是怎麼在面對大環境的危機與挑戰。以下則分別從客觀的測量角度及主觀的治療角度探討家庭的功能與發展。

一、家庭系統觀點的實務與研究

如同前述，家庭治療實務與家庭研究之間一直存在著各自為政的斷裂。Olson、Sprenkle 與 Russell (1979) 一直希望透過概念的分析及測量工具的建立，系統性地結合這兩個世界。Pinsof (1992) 在十年後亦提出「家庭心理學」(family psychology) 的領域來作為「家庭治療」與「心理學」之間的交界。Pinsof 認為若要結合這兩個世界，有三個主要成份，包括有系統成份 (system component)、整合成份 (integrative component)，及歷程成份 (process component)，其觀點總稱為「整合/歷程/系統觀點」(the integrative process systems perspective)。以下則分別摘述他對此三個成份的看法。

(一) 系統成份 (the system component)

他認為「系統」不是單一的現象，而是多元的，所以他使用複數的「系統」，而非單數的「系統」。這牽扯到背後的方法論立場，他認為從本體論 (ontological) 上，他相信有獨立客觀的真實 (reality)，但從知識論上 (epistemological)，他認為人類不可能有對此「真實」的終極/客觀/絕對的知識。因此，我們或多或少對「家庭」能增進些了解，但不可能有完全/絕對的診斷性了解。人們對「家庭」的知識是建構中的，對家庭評估的典範觀點也是在特定時空/社會脈絡下由一群人在互動中建構成的，因此，對家庭的認識與評估是個與時並進，從未停止的過程。

既然「系統」是複數的，也是建構的。家庭生活可包含有最小單位的「自我系統」，到最大的「社區/文化系統」，其中則交織著「手足系統」、「婚姻系統」、「核心家庭系統」、「擴展家庭系統」等等。而系統間的互動更是具雙向性 (mutual) 及循環性 (circular) 的，不同層次間的系統即透過此互動作用而相互地影響著。而家庭治療也只能算是其中一種「治療系統」(therapy system) 的介入而已，無法全部改變家庭的複雜系統。

(二) 整合成份 (the integrative component)

不同系統動力間的「整合」(integrative)，常被誤解或操作成「折衷」(elective) 的拼湊。Pinsolf (1992) 認為其間的差別，在於是否能後設的參考架構 (metaframeworks) 以統整不同系統間的小概念。而此後設的參考架構則與文化系統 (culture)、性別系統 (gender) 及發展系統 (development) 等有密切的關聯。在傳統的心理學領域中對這些系統不是嚴重忽略，就是缺乏系統性的觀點。Pinsolf 認為，這統整性的後設架構能讓家庭心理學與其他心理學領域，如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區心理學及發展心理學之間的連接更為緊密，促進更多有關個人與社會系統之間互動現象的了解。如此，家庭心理學才能加深及加廣對家庭生活品質的促進。此統整架構也有助於我們對家庭治療的思考。有別於表面症狀的處理，若能釐清背後維持此症狀的問題維持結構 (Maintenance structure)，將更能協助家庭功能的運作。

(三) 歷程成份 (the process component)

傳統上，心理治療的研究被分成兩種取向，「歷程」(process) 取向及「結果」(outcome) 取向。1970 晚期至 1980 年代，由於客觀科學典範的影響，大部分的研究都朝向「結果」取向，直到近來才開始有學者提出對「歷程」取向的關注。若不關注「歷程」，就無法得知「變化」是如何產生的。「歷程性的研究」(process research) 是探究變化的歷程，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個歷程，家庭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時間演化而轉進的，而且經常是多重系統，甚至是多代系統同時隨著時間共同交織成的演化歷程。

二、家庭系統研究對家庭功能的評估

其實，在 Pinsolf (1992) 提出此整合觀點之前，Olson 等人 (1979) 就嘗試提出雙向度的「環繞理論」(circumplex model) 以統整諸多有關家庭系統動力的概念。這些概念多半由家庭治療的領域中提出的，其中，如家庭凝聚 (family cohesion) 向度就囊括了近 40 個相關概念，家庭調適 (family adaptation) 也包含了與回饋系統 (如 morphostasis 與 morphogenesis) 相關的諸多概念。

而「平衡」(balance) 是 Olson 等人 (1979) 在界定這些理論概念時主要的精神。如對「家庭凝聚」(family cohesion) 向度的界定就包含有「情感連結」(bonding) 及「自主」(autonomy) 兩

個主要成份。(e.g. The emotional bonding members have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degree of individual autonomy a person experiences in the family system.)

然而，遷就於紙筆式線性的測量，凝聚分數太高就成爲“極端”(extreme)與“沾黏”(enmeshment)，太低就成爲「疏離」(disengagement)。而「中度」(moderate)的分數被界定爲“平衡”(balance)功能的最佳展現，也被視爲是對個體發展及家庭功能最有助益的因素。同樣的，「家庭調適」(family adaptation)向度也包含了「改變動能」(morphogenesis, change)及「穩定動能」(morphostasis, stability)二種動能之間的平衡。

Olson 等人(1979)進而將凝聚力與適應力二面向做爲環繞模式的兩軸，依凝聚力與適應力的強弱(各分四級，如前述)將家庭與婚姻分成十六型。Olson 等人認爲「平衡」是功能性良好與否的判準。具功能的家庭系統被界定爲中程度的「凝聚力」與中程度的「調適力」，包括有「彈性若離」(flexibly separated)，及「彈性連結」(flexibly connected)，「有序若離」(structurally separated)，及「有序連結」(structurally connected)等四類系統。而失功能的家庭則包括有「無序疏離」(chaotically Disengaged)，「無序糾纏」(chaotically enmeshed)，「僵化疏離」(rigidly disengaged)，與「僵化糾纏」(rigidly enmeshed)等四類系統。

關於家庭調適功能的探討，Olson 等人(1979)最終極的關心仍是在於如何診斷出「功能良好」與「失功能」的家庭系統，並提供「治療」的方案。雖然，Olson 及其研究小組不用「失功能」(dysfunctional)的名稱，而用「平衡」(balanced)的名稱，但其研究關注與早期的一些著名的家族治療者，如 Minuchin、Bowen 等人，都是在臨床機構站在保護「問題」孩童或青少年的角度，所提出的研究觀點一樣，在於解決「問題」家庭系統，以解決「問題」青少年與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雖然這些學者持續的努力，對某些家庭動力的現象提供了諸多貢獻，但也因其某些關注立場而面臨著諸多的限制，如過度偏重在「問題」家庭動力的探討，過度遷就紙筆式量性的測量，視家庭爲封閉的小系統等等的假定，而忽略了廣大「正常」家庭動力與複雜互動歷程的探討。

由於 Olson 等人(1979)所提出的理論模型相當程度整合了家庭研究與家族治療之間的落差，同時又設計了簡單易實施的自評式測量工具 FACES，二十年來普遍受到實務界與研究界的關注，蔚爲風潮。雖然此理論模式最受到批評的即是在實徵研究上，無法呈現出理論架構上的曲線關係，(亦即「平衡」概念下，過猶不及的辯證關係，如過高的「凝聚」變成「糾纏」；過高的「調適」變成「僵化」等概念)，而呈現的是直線的關係。Olson 等人則認爲這是因爲一般紙筆式的測量受試，無法找到極端型的家庭，因此曲線關係不易反映。

Olson 等人(1979)亦同意他們的理論架構與測量，的確是以美國白人的主流文化爲基調。事實上，他們主要的樣本群亦是來自白人的教會團體，成員們主要是白人的路德教會信徒或教友。上述的諸多爭議，其實都與社會文化脈絡有關。不只包括界定「平衡」的標準，更包括這兩個向度的測量內容，都在在反映主流社會文化的脈絡。以我們自己的文化而言，如何重新界定「平衡」(balance)，及不同型態的家庭如何在面對其社會環境的挑戰等都是不可迴避的課題¹。以下則分別從文化、社會、及研究典範等脈絡觀點提出對「環繞理論」的批判性思考。

¹ 至於「文化」的問題，Olson (1999)亦修正他們原先的假設：「在某些不同於白人文化的社會中(如西班牙文化、東南亞文化)，不平衡的家庭系統，不一定就是功能不佳」來回應先前被批評的「白人文化」問題，因爲在那些文化中的「期望」系統是需要被認真考慮的因素。

三、對「環繞理論」的批判性思考

(一) 去「文化」的家庭系統理論

若將家庭視為一小型社會，不同的文化價值亦當會影響家庭中的成員對「界限」、「自主」，與「改變」等構念的界定。研究者認為在對家庭系統的內涵作定性時，即會碰到有關「分化」(differentiation)，「界限」(boundary)，及「統整」(integration)等爭議。而這些問題卻都與社會文化脈絡脫不了關係。如「分化」議題牽涉到「獨立 vs. 相依」(independence vs. interdependence)的不同內涵；「界限」議題則牽涉到「分離 vs. 連結」(separate vs. connected)的不同內涵。而「統整」則牽涉到「位階系統 vs. 平權系統」(hierarchical systems vs. equalitarian systems)的不同內涵等。一些本土的心理學者如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1991)則提出，在「關係取向」的文化架構下，中國人的自我可稱為「關係性自我」。自我對他人的存在，具高度的覺察能力。自我與非自我間的界限較不清，人我的疆界亦較不明。楊中芳(1991)更指出，中國人「自己」的特色之一，即是其「界限」的伸縮性。透過「自己」的修養過程中，「自己」的界限又逐漸地由「個己」，超越轉化成包含許多他人的「自己」。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個人由「己化」進行對「個己」的超越轉化，「自己」與「社會」融為一體。這種對於伸縮性的觀點，與西方有所不同。同時，中國人的自主性也是表現在「克己復禮」的道德實踐上，以克制價值實踐，即超越轉化的途徑，來使「自己」與「社會」相結合。

劉惠琴(2007)在對 FACES II 的本土性研究中即發現比如，Olson 等人(1979)原先在界定「家庭界線」時，即將僵硬及模糊的代間界線界定為功能不好的系統屬性。而在界定「聯盟關係」時，即將「親—子」的聯盟關係界定為功能不好的糾纏(enmeshed)家庭屬性。這些理論概念的界定與華人社會中所強調的「以父為尊」、「家人一體」、「伸縮性界限」等家庭文化特色有所不符。另外，在界定「調適向度」中的「角色分擔」概念時，Olson 等人將刻板角色與角色僵化等屬性界定為功能不好的僵化家庭屬性，但華人家庭中「各盡本分」、「認份分擔」的正面特色，就有可能被界定為「僵化」、「刻板」、「不流動」。最後在界定「彈性家規」時，Olson 等人強調規則的公開才是功能好的家庭調適，但這也與華人家庭中常見「隱而不宣」的家規屬性有所不符，「隱而不宣」並不表示就沒有調整的彈性。另外，凝聚量尺與適應量尺間之相關高，而因素分析結果之因素負荷量亦多集中在「凝聚」因素之現象。無論是大學生樣本或是夫妻樣本，皆呈現出家人「齊心」的凝聚現象為最主要的內涵，而「協力」之調適向度則為輔助之內涵，家人情感更甚於權力結構的調整。至於為什麼這兩個向度間會呈現如此緊密的關係，研究者認為可能與華人社會中穩定而長久的父權家庭結構有關。這種家族社會會隨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變遷而有所調整。西方社會，在工業革命之前，父權家庭結構亦相當穩定。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生產方式改變，社會生活隨之改變，家庭生活亦不得不面臨改變，「平權化」的家庭關係逐漸地取代了「父系家族」(patriarchy)的關係(高達觀, 1978)。台灣深受華人家族意識所影響，相較於歐美，國人的家人關係仍正面臨「父系結構」的影響，導致平權的調適向度不夠獨立，而與凝聚向度緊密相連，家庭團結的重要性仍然優於民主的家庭關係。若家庭系統是建構的，那麼特定文化脈絡下生活的人們，當然也會形成他們對家庭的認定。

(二) 去「性別」與去「階層」的家庭系統理論

「環繞模式」的相關研究報告中，很少提及「性別」關係的影響，少數提及的性別現象，如 Sprenkle 與 Olson (1978) 的臨床研究中發現臨床樣本比一般樣本，呈現在「領導控制」變項上較極端的分數，不是「過緊」，就是「過鬆」，而這些臨床上的極端樣本基本上都是以妻權為主(wife-led)的家庭。Sprenkle 與 Olson 亦引述另一篇 Druckman 對虞犯青少年家庭的研究中，發現這些家庭原來都是呈現低「凝聚」(cohesion)及高「調適」(adaptability)的系統狀態，經過家族治療之後，則在兩個向度上皆呈現趨中(moderate)之傾向。然而，少數非常高「凝聚」的家庭，其少女「再犯」的機率較高。這些其實都暗示了「女性」、「高凝聚」、「極端」三者之間有著某些互動關係，也說明了這些相關的家庭研究報告中，都存在著性別的經驗，但卻都不被深入討論。在過去的家庭關係研究中，「父母親」多半沒有性別；「青少年」也沒有性別，好像在家庭互動中，父母親是同一種人，男性青少年與女性青少年也是同一種人。「性別」多半只做為附帶的人口背景變項而已，報告中亦只交代有無性別差異的統計結果，至於為何有性別差異？為何無性別差異？差異所反映的意義為何？研究結果的不一致處怎麼解釋等問題，幾乎都不做深入的討論。除了性別的觀點外，家庭的互動歷程亦可能受著社會階層的影響。台灣社會在急遽的變遷中，傳統的父系主義與資本社會的功利主義交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教育資源與經濟資源的獲得，往往也決定了人們的生活處境。因此，雖然同為父親或母親，在生活不同處境中的父母親，其面貌亦會有所不同，親子互動的型態亦當有所不同。然而這些可能的「不同」，在傳統對家人關係的學術研究報告中，亦少有討論。若根據 Pinsof (1992) 提出的系統觀點亦認為系統是複數的，是建構的，因此不同家人對系統知覺的差異是重要的，也是長期被忽略的。

(三) 對「平衡」的界定一直線關係看不到「統整」的平衡

Melito (1985) 強調家庭的調適功能(adaptive functioning)特別與家庭系統的組織功能有關(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組織系統統整了「改變動能」與「穩定動能」這二股動力。而這個組織系統應該是對家庭周遭的環境開放，保持內/外對流的平衡。通常我們稱之為「彈性」(flexibility)。過去，家庭治療學者對家庭調適功能，都各有描繪。如早期提到的朝向規範穩定的「負向回饋」功能(negative feedback, the system has returned to the norm)，後期則認為前述之功能太保守，則又提出朝向促進改變的「正向回饋」功能(positive feedback, change-promoting process)。「正向回饋迴路」(Positive feedback loops)創造「改變」的可能，但是「負向回饋迴路」(negative feedback loops)則致力於系統的「穩定」，兩股動力複雜的互動則需賴統整與組織的系統，保持平衡。而家庭成員們對此歷程的關注與覺察，則是維持系統能運作的重要關鍵。而具良好「分化」及統整功能的家庭是容許家庭隨環境的挑戰而變化，同時又能保持其統整性。Melito 認為家人間的良好分化(subject-object differentiation)，會使家人間能有更多的自由以因應外界變化。另外，家人間的共同價值，如對家的共同認同(family identity)等則是有助於家庭系統間的整合。

事實上，在 Olson 等人(1979)原先對家庭向度的定義中，可看出他們對「平衡」的看法，其實也是一種辯證式(dialectic)的思考。如在「調適向度」的定義上即包含有「穩定」(permanence)與「改變」(change)的兩股動力，而「平衡」指涉的本來是對此兩股動力的統整功能。然而，在 Olson 等人的實徵研究結果中，反映出來的卻是中程度(moderate)的直線效果，無法反映出二股動力的統整(integrate)的歷程。這也是「環繞模式」備受爭議之處：原來假設的曲線關係，在實徵研究結果卻只呈現出直線關係。關於這點，Lee (1988) 提出「一級改變」(first order)與「二級改變」(second order)的概念來加以釐清此爭議。他認為 Olson 等人所測量的「調適向度」，是指表層家庭結構特徵的調整改變，係屬較低層次的「一級改變」；而另一種改變，他稱之為「負回饋調適」(negentropic adaptability)，指的是家庭系統中面對環境壓力而改變的機制，係屬較高層次

的「二級改變」。類似的觀點，Melito (1985) 亦延用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中「調節作用」(regulation) 與「運作作用」(operation) 的概念來說明調適歷程的不同層次。「調節作用」指的是低層次的改變歷程，其中「穩定」與「改變」是以對立與分裂的樣貌呈現；然而「運作作用」指的是高層次的統整歷程，其中，個體能同時面對改變，並保持主體的穩定。也就是說，求穩定的力量 (morphostasis) 與求改變的力量 (morphogenesis)，是同時存在的，而不是分立的兩股力量。健康的家庭是能夠統整此兩種機制，不但能保持其主體的穩定性及連續性，而且能夠發展新的行為模式以面對環境改

變的需要。然而，在傳統的家庭研究中，此種統整作用的歷程是較少被探索的²。

綜合上述的討論，研究者認為無論是「一級改變」或是「調節作用」，回答的是「什麼」(what) 的改變；而「二級改變」或是「運作作用」回答的則是「如何」(how) 的改變。而此種統整歷程的探索，從量化的研究傳統，多半是用數字法則來「客觀」呈現的，但卻得受限於數學統計的直線假定，其間有多少的揮灑空間，則有待更多的創造性探究，如 Pinosof (1992) 所提出的「後設參考架構」指的是什麼？怎麼呈現？

為了更能貼切測量環繞理論三個向度，Olson (1999) 提出，多重方法的測量 (multi-method assessment) 包括內部觀點的測量 (insider's perspective) 及外部測量 (outsider's perspective) 的測量，多重成員的測量 (multi-person assessment) 包含家中多成員的測量；多重特質 (multi-trait assessment) 的測量，包含有針對上述三向度的測量；及多重系統 (multi-system) 的測量，包含有個人系統、婚姻系統、親子系統、及整體家庭系統等的測量。針對上述的測量改進，Olson 與 Gorall (2006) 提出了 FACES-IV 的測量工具，包括了三個向度的測量尺及六個家庭類型的測量，其中特別著力在四個非平衡家庭的測量。在統計分析上，則以「比率分數」(ratio score of balances/unbalanced scales) 來反映健康家庭的指標。

至於「家庭調適」的動態歷程的問題，Olson (1999) 重申：「婚姻與家庭系統是會隨著環境的變化³要求而調適改變的。」尤其是當家庭中妻子要求公平權力時，及青少年要求獨立時，這種調適的壓力會更迫切，在測量上，Olson 建議以個案家庭在不同時間的測量變化，以類型變化的圖塊變動來反映這種變化（如從「彈性／分離」走向「彈性／混淆」，再到「僵硬／混淆」……等等。）在大樣本統計上則用平衡家庭類型與極端家庭類型的百分比率分佈的變化來呈現時間的變化。

而這種家庭調適與改變過程是有其「發展性」的。Widdershoven (1994) 曾指出，過去在探索「發展」的理論中，常持有的是「家庭進展」(progress) 的觀點，而不是「發展」(development) 的觀點，前者的這種「以現在看未來」的對外來預測觀點，不自覺受科學典範的影響，家庭視為一種「機械模型」(the mechanistic model) 或「機體模型」(the organismic model) 有其特定的機械組成或結構與組織機能，其改變的方向是可以預測或解釋的。而「敘說模型」(the narrative model) 是認為人們透過「敘說」反映其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意義」是詮釋出來的，故事的「意義」不斷

² 關於「二級改變」的這個議題，Olson 於 1999 年的發表中提出了「溝通」(communication) 向度來加強環繞理論的效力。「家庭溝通」被認為是可以催化「凝聚向度」與「調適向度」的催化向度，其中包括了傾訴、表達、澄清、自我揭露、尊重、連續性檢視等能力。平衡系統 (balanced) 的家庭類型比不平衡系統 (unbalanced) 的家庭，溝通能力較佳。Olson (1999) 提出此三向度模式 (three-dimensional model) 以回應先前被批評的「二級改變」問題。

³ 此處的「環境」是指家庭所處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包括社會規範、政策、產業環境、及時間發展等所產生的「變化」，如家庭會面臨的離婚、失業、病亡、子女長大離家等等皆與這些大環境的變動有關。

在敘說者與敘說故事的對話中形成，並改變著，而「發展」的變化亦彰顯在敘說故事軸線的變化之中。

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家庭心理學的研究者如何努力保持創意在貼近複雜的家庭互動現象，如用多重測量來反映家庭系統的多面性，不過在實際測量時，必然也會遭逢成員流失、測量成本太高及統計方法無法契合等問題。尤其在測量家庭調適改變歷程時，由於「改變」牽涉到時間，家庭從縱時性資料的流失及相依小樣本統計方法的選擇問題等也都是常遭爭議之處。因此，有些家庭心理學的研究者也在思考不同的研究典範探究不同家庭現象的契合性問題。從質化的研究典範來看，家庭治療常用的家庭重塑（sculpturing）技術，即是讓成員們重新回顧家庭經驗，並發展此整合回顧的觀察能力。研究者認為，家庭敘說（narrative approach）的研究方式，是探索此整合歷程，相當有力的方式。從家庭成員彼此怎麼敘說家庭的故事中，即可深入瞭解此「整合歷程」呈現了什麼特別的機制。家庭成員若無法發展出「觀察」家庭「如何」互動的能力，則只能做出「進退失據」（flipping over）的現象，而產生家庭系統不是「過緊」（rigid），就是「過鬆」（chaotic）。基本上，研究者同意上述的學者對「辯證—平衡」的觀點，而且認為「凝聚向度」代表的是「求穩定」的動力，而「調適向度」代表的則是「求改變」的動力，二股動力在不同的情境壓力中尋求最佳的平衡。只是如此複雜的「辯證—平衡」動力歷程，如何具體呈現，才是研究者最大的難題。基於上述之觀點，本研究希望能結合量性與質性研究設計共同探究家庭系統功能如何隨著社會環境中的變動而有所調適？雖然 Pinsof（1992）提出了結合研究與實務的「整合／歷程／系統觀點」，但卻未有系統性的測量及實徵性研究結果來支持其觀點；而 Olson 等人（1979）所發展出來的測量工具及理論，雖被批判為去文化、去社會的小系統觀，但由於其工具及理論的普遍被使用，多少捕捉些家庭的動能，因此本研究將以 Olson 等人發展出來的 FACES 測量工具，並結合家庭敘說的方法，批判性地使用量性研究及質性研究設計共同捕捉家庭系統的動能及調適歷程。

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標

本研究以量性設計及質性設計二種研究程序共同探討以美國社會所發展出的家庭系統量表如何測量本地的青少年與其家人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差異，及家庭系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大環境的挑戰而調適的現象。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主要以晚期青少年家庭為主。一來因為青少年階段的自主任務，使得家庭的挑戰遽增，是探討家庭調適歷程的貼切時機；二來則是方便與研究者過去的研究樣本配合。基本上，本研究樣本分為三階段蒐集，第一階段為大樣本的大學生班級團體。第二階段的研究樣本則是以研究者過去在親子個體化研究的樣本群中，徵求青少年家庭參與焦點團體的研究。焦點團員徵求的原則，除了高度的參與意願外，儘量兼顧不同性別及不同類型的家庭背景，共三十六位成員。第三階段則徵求有意願的焦點團體成員及其家人進行家庭訪問資料的蒐集。

三、研究過程

(一) 大樣本班級施測⁴

基本上，以大學心理系及通識課程學生，依分層團體隨機取樣方式取得樣本，在班級內團體施測「家庭系統量表」。大樣本之特徵描述，詳見表 1。

表 1 大樣本特徵描述 (N=277)

性別		年級					戶籍				
男	女	一	二	三	四	五	北	中	南	東	其他
40.6%	59.1%	24.1%	38.8%	15.3%	12.3%	2.8%	52.4%	23.3%	13.8%	5.0%	4.8%

父職業				母職業			
基層勞工	基層員工	中級主管	高級主管	基層勞工	基層員工 (含家管)	中級主管	高級主管
25.6%	55.9%	13.7%	1.6%	9.8%	81.2%	8.5%	.3%

(二) 小樣本家庭系統測量之焦點團體實施

基本上，研究者邀請過去參與親子個體化研究團體中的三十六位成員繼續參與本次家庭系統測量的焦點團體。成員主要是大三、大四的學生，性別約各佔一半。團體中施測「家庭系統量表」並針對難作答之題項進行焦點討論。三十六位成員分別在六個焦點團體中進行，由研究者及助理們帶領討論。

(三) 小樣本家庭訪問之實施

焦點團體後再邀請此三十六位成員一起參與，擔任家庭田野的帶領人，進入個別家庭，邀請家人針對其家庭系統知覺的半結構性訪問。訪員可由帶領人自己擔任或由其他成員擔任。因此，家庭訪問之樣本亦同時為上述「小樣本家庭系統測量之焦點團體實施」程序中之樣本。

本文之研究結果呈現，則以其中的三個家庭為例，以 Q 因素分析家庭系統量表之量性資料及家庭敘說之質性資料共同探究家庭系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大環境的挑戰而調適的現象，其中 Q 因素分析資料與家庭敘說資料均來自於同一家庭。

四、研究工具

(一)「家庭系統量表」

取自 Olson 等人 (1992) 編制的「家庭系統量表」(FACES-II) 翻譯而成。內容包含有「家庭凝聚」與「家庭調適」二個分量表。前者指的是對家庭情感凝聚力的知覺，後者則指的是對家庭調適力的知覺。凝聚量尺的信度係數 α 值為 .87；調適量尺的信度係數 α 值為 .78。全量尺共有 30 題五點量尺的題目。其中，凝聚向度含 16 題，調適向度含 14 題。選擇 FACES-II 而非 FACES-III

⁴ 大樣本的資料另一主要目標作為分析本地家庭系統測量所反映出來的內涵與向度，已另文發表，在此不做討論。此處的目標在於分析青少年樣本如何知覺其家庭系統的變動。

的理由，是根據 Olson 等人的建議。一來是因為 FACES-II 的信、效度均顯著比 FACES-III 高；二來是 FACES-II 的題目較多，提供較多提供修訂的訊息。⁵

(二) 半結構性的家庭訪談綱要

訪談的綱要包括：1. 協助受訪者畫家庭圖，2. 討論家庭圖與家庭關係，3. 填答「家庭系統量表」4. 量表中較難回答的題目，5. 家庭中曾發生的變化，6. 家庭中的煩惱等問題。

五、資料處理

(一) 以簡單相關分析方法探討家人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差異與共識

研究者同意 Kazak (1992) 的觀點，認為家庭內不同角色的家人在面對「家庭變化」時會有不同的詮釋與壓力，而這不同家人間的差異也促成了家庭變化的可能。因此，本研究儘可能分別對不同的家庭的成員測量其對家庭系統的知覺，並以數學統計的集中量數概念（如平均數），以及分離量數的概念（如變異量數）來界定家庭系統各分系統間的差異與整合現象。如用集中量數屬性的「算數平均數」來界定家庭的整體共識（家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集中情形），用變異量數屬性的「差距分數」來界定家庭內成員間的差異（家庭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分散情形）。上述的統計界定乃依循 Olson 等人 (1992) 的建議而採用此界定方式。公式如下：

$$\begin{aligned} \text{父—子(女) 凝聚} &= \frac{\text{父凝聚} + \text{子(女) 凝聚}}{2} & \text{父—子(女) 調適} &= \frac{\text{父調適} + \text{子(女) 調適}}{2} \\ \text{母—子(女) 凝聚} &= \frac{\text{母凝聚} + \text{子(女) 凝聚}}{2} & \text{母—子(女) 調適} &= \frac{\text{母調適} + \text{子(女) 調適}}{2} \end{aligned}$$

$$\text{家庭凝聚平均數} = \frac{\text{父凝聚} + \text{母凝聚} + \text{子(女) 凝聚}}{3}$$

$$\text{家庭調適平均數} = \frac{\text{父調適} + \text{母調適} + \text{子(女) 調適}}{3}$$

$$\text{父—子(女) 差距分數 (HAD)} = \sqrt{(\text{父凝聚} - \text{子凝聚})^2 + (\text{父調適} - \text{子調適})^2}$$

$$\text{母—子(女) 差距分數 (WAD)} = \sqrt{(\text{母凝聚} - \text{子凝聚})^2 + (\text{母調適} - \text{子調適})^2}$$

$$\text{家庭差距分數} = \frac{\text{HAD} + \text{WAD}}{2}$$

(二) 以簡單相關及 t 檢定法探討大學生受試者對其家庭系統知覺的連續性與變化性

研究者將 FACES II 問卷分別以指導語標示，要求受試界定家庭變化之分界時間點及關鍵事件，並依此分界點前後，分別回答 FACES II 問卷內容。研究者則將依關鍵事件內容性質作分類整

⁵ 本研究進行期間為 2003-2004，之後 Olson 與 Gorall (2006) 亦發表 FACES-IV 的修改版，此版的題項主要取自 FACES-II 與 FACES-III 的題項，因此與此二版本有高度的相關。主要的修改在於「平衡」(Balanced) 家庭的界定改由相對的比率分數 (Ratio score) 取代原來的絕對分數分類，以更捕捉健康家庭與問題家庭間的變異性。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閱讀該文獻，同時亦感謝審查人之一提醒此新的訊息。

理，並將分界時間前後受試與知覺到之家庭系統分數以相依樣本之簡單相關及 t 檢定等統計方法以探討大學生受試如何知覺其家庭系統的連續性與變化性。

(三) 以 Q 因素分析描繪家庭動力之變化

Q 因素分析法相較於傳統因素分析法較不被普遍運用，其分析原理與傳統的因素分析法相似，但分析的是成員間的相關矩陣 (Q correlation)，而非變項間的相關矩陣 (R correlation)，關注的是成員間的變異。近來有學者 (Brown, 1993) 提倡此分析方法作為系統性探究人類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量化分析方法。於本研究中，研究者嘗試以此方法系統性地了解以「家庭」為主體的動力變化。操作方式即將原建立之相關矩陣，轉矩陣成縱列為變項列，橫欄為家庭成員欄，建立 Q 矩陣後再進行因素抽取程序。在本研究中，每個家庭的 Q 因素界定為 1 個，主要在了解個別成員對家庭的投入程度 (由個別因素負荷量得知)，再由不同時間測得的總因素負荷量的變化，了解成員們對家庭整體投入程度的變化。

(四) 以質性敘說分析方法探討相關家人對家庭調適行動的詮釋、理解，與行動意向，以補充前述 Q 因素分析所呈現之變化背後的主觀詮釋性資料

家庭敘說的資料則依訪問的主題進行主題式的分析。另外，亦輔以訪員的觀察札記及家庭圖相關資料。

研究結果

一、系統內「差異」與「整合」的動能一家人間對家庭系統的知覺會一致嗎？

不同的家人，對家庭系統的知覺會一致嗎？研究者從小樣本中蒐集有其他家人資料者，以大學生受試為主，算出其分別與父親、與母親，與手足之間，在家庭系統知覺上的相關程度，由於樣本數不大，且父親的反應率頗低，故此相關程度的顯著性考驗僅列做參考之用。從表 2 中約略可看出，青少年與母親及與手足在對家庭系統中調適向度的知覺，相關較高，與父親則最無關連。

表 2 家人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父—子女	母—子女	手足
凝聚向度	.08 (N=21)	.522 (N=27)	.387 (N=21)
調適向度	-.196 (N=21)	.527* (N=27)	.594* (N=21)

接著，研究者進一步以平均數代表家中成員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共識⁶，以大學生為主，分別計算出其與父之平均，與母之平均，與手足之間的平均，全家之平均等與大學生對其家庭系統知

⁶ 理想上，希望用集中量數屬性的「算數平均數」來代表家庭的整體共識 (家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集中情形)，此處的統計界定乃依循 Olson 等人的建議而採用此界定方式。

覺間的關連。表 3 及表 4 中呈現出，與父母親在凝聚向度上共識的相關顯著大於在調適向度上共識的相關，而與母親共識的相關又顯著高於與父親共識的相關。在與手足的共識上，無論是在調適向度或是在凝聚向度上都呈現高度的相關，尤其在調適向度上，其相關甚至高於父母親。手足系統在本樣本中的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研究者以差距分數代表家中成員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差異⁷，仍然以大學生為主，分別計算出其與父之差距，與母之差距，與手足之差距，及家庭差距與其對家庭系統知覺之關聯。表 4 中呈現出，無論是父差距、手足差距、家庭差距，均與青少年對其家庭系統之知覺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其中，與父親差距的相關最大，其次手足，與母親差距則沒有顯著的關聯。

綜合上述表 2、表 3 與表 4 的結果，說明了青少年對家庭系統的知覺與其母親及手足之間較傾向一致，而與父親的知覺則較無相關。而從系統間的整合程度來看，與手足及與父、母親在家庭系統的共識程度均會正面地關聯著青少年對其家庭系統的知覺，相對的，與手足及父親在家庭系統的差異程度亦中程度地、負面地關聯著青少年對家庭系統的知覺，與母親的差異則未有顯著之關聯。有意思的是，在凝聚向度方面，青少年與母親及與手足間的共識，對家庭「向心」正面的影響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與父親的差距對家庭「離心」負面的影響，亦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與手足則同時對於家庭的凝聚向度及調適向度有著比父母更關鍵性的關聯，三者分別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整體而言，家庭共識與青少年的家庭知覺呈現中程度的正相關，而家庭差異則呈現中度的負相關。

表 3 平均分數與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父平均		母平均		手足平均		家庭平均	
	凝聚	調適	凝聚	調適	凝聚	調適	凝聚	調適
凝聚向度	.690** (43)	.044 (43)	.796** (53)	.189 (53)	.701** (63)	.476** (63)	.542** (122)	.236** (122)
調適向度	.419** (43)	.066 (43)	.655** (53)	.344* (53)	.690** (63)	.655** (63)	.415** (122)	.332** (122)

表 4 差距分數與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父差距	母差距	手足差距	家庭差距
凝聚向度	-.491** (43)	-.177 (55)	-.276* (53)	-.280** (87)
調適向度	-.460** (43)	-.157 (55)	-.394** (53)	-.325** (87)

二、系統內外的「演化」動能—家庭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演變嗎？

⁷ 理想上，希望用變異量數屬性的「差距分數」來代表家庭內成員間的差異（家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分散情形），此處的統計界定乃依循 Olson 等人的建議而採用此界定方式。至於此界定方式是否合宜，是有不同的爭辯。感謝審查人 B 提供 Bartle-Haring、Kenny 與 Garazzi (1999) 曾提出 Multitrait Multimethod 的方法設計亦可以是解決途徑之一。

(一) 家庭系統變化的分界事件

受試在作答家庭系統問卷時，先針對此時的_{家庭}作答後，再回顧過往的家庭是否有不一樣？若有，則記下關鍵事件後，再針對過往的家庭作答一遍⁸。約有 1/3 的受試者自覺到家庭系統的改變。從表 5 可看出，受試們歸因的分界事件，依序最多的為「長大」、「關係變化」等自然內因性的事件，其次則是家庭結構與空間結構的改變，再其次則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與意外。整體來看，影響家庭系統改變的因素，內因與外因幾乎各佔一半。但仍有 2/3 的受試者並未自覺到家庭系統的改變。可見，多數青少年並不覺家庭系統的改變，這可能與大學生的生活較偏在自主發展之任務有關。而在自覺家庭系統變化的樣本中，亦較多覺察到較內因性的個人及家人關係的變化；較其次才會覺察到經濟結構與空間結構等較外因性的轉變。

表 5 家庭系統變化的分界事件

外因	變項	總次數
	1. 家庭結構的變化 (e.g. 結婚、離婚、死亡)	22 (16.92 %)
	2. 經濟結構的變化 (e.g. 失業、退休、經商失敗等)	14 (10.77 %)
	3. 意外 (e.g. 車禍)	9 (6.92 %)
	4. 空間結構的變化 (e.g. 搬家、外地求學或工作)	20 (15.38 %)
內因	變項	總次數
	5. 長大 (e.g. 獨立、戀愛)	35 (26.92 %)
	6. 關係轉變 (e.g.)	24 (18.46 %)
	7. 觀念轉變 (e.g. 覺悟、信仰或價值觀改變)	6 (4.62 %)

(二) 過去與現在對家庭系統知覺的關聯⁹

表 6 與表 7 呈現的是從青少年眼中，對過去與現在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及平均數的差異。整體來看，過去的家庭系統與現在家庭系統的相關均屬高度的正相關（凝聚向度；調適向度.67）。因此，從青少年眼中，過去的家庭系統與現在的家庭系統雖有不同，但仍有高度的延續性。從表 7 的平均數中看出，現在的家庭系統向度有大幅度的增高，其中較清楚有顯著變化的是在凝聚向度中的「家庭連結」、「家人界限」、「共同決策」等，及在調適向度中的「領導參與」、「管教參與」，

⁸ 此處以「回顧」方式蒐集回溯性的資料，其關注不在客觀特定階段對家庭系統變化的預測，而在於受試者對其家庭系統之主觀知覺的現象意義。其背後依循的是現象學的方法論典範與邏輯實徵的方法典範對於「回溯性」資料有不同的價值認定。因此，受訪者在此時作答時，係以此時對當時意義的認定。

⁹ 此處所使用的統計處理，由於係相依樣本（同一受試分別對過去家庭與現在家庭）所做的測量資料，均依相依樣本的顯著性考驗判準處理。

與「自我肯定」等變項上，其他，在角色分擔、家人聯盟、家庭朋友，及家庭休閒等變項上，過去與現在則未呈現顯著差異。在角色分擔與家人聯盟方面或許說明了家人互動結構的穩定性；而在家庭朋友及家庭休閒方面或許與國人生活中很少有家庭渡假等生活方式有關。

上述結果說明了，青少年在知覺其家庭系統時有其連續性，同時也有其變化性，變化的方向則朝向較高的家人情感凝聚及較彈性的家庭結構的調適。

表 6 過去與現在對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過去家庭凝聚	過去家庭調適	現在家庭凝聚	現在家庭調適
過去家庭凝聚	1.000	.775**	.724**	.584**
過去家庭調適	.775**	1.000	.556**	.672**
現在家庭凝聚	.724**	.556**	1.000	.815**
現在家庭調適	.584**	.672**	.815**	1.000

** $p < .01$, $N = 277$

表 7 過去與現在家庭系統之差異

	連結	界限	聯盟	時間	空間	朋友	決策	休閒	凝聚	肯定	領導	管教	協調	角色	家規	調適
過去																
平均數	6.8	6.07	6.17	5.74	6.74	5.80	6.09	6.28	49.69	9.13	5.40	5.64	7.87	5.90	5.95	39.88
標準差	1.94	1.90	1.95	2.01	1.88	1.88	1.65	1.87	11.34	2.96	1.97	2.05	2.27	1.86	1.93	9.83
現在																
平均數	7.24	6.32	6.28	5.69	7.04	5.97	6.36	6.48	51.32	10.18	6.16	6.36	8.39	6.02	6.34	43.44
標準差	1.91	2.00	1.84	1.98	1.90	1.89	1.69	1.94	11.65	2.72	1.89	1.90	2.40	1.87	1.82	9.32
T 值	4.21***	2.41*	.80	-1.30	2.17*	1.41	2.95**	1.14	2.23*	6.16***	7.53***	7.16***	3.81***	1.02	4.24***	6.86***
顯著性	.000	.017	.425	.193	.031	.159	.003	.254	.027	.000	.000	.000	.000	.309	.000	.000

** $p < .01$, $N = 277$

(三) 家庭內動力演化之描述分析

研究者嘗試以 Q 因素法系統性地描述以「家庭」為單位的動力變化。研究者將原登錄之家庭系統測量資料矩陣反轉成家人為變項軸，家庭系統問卷題項為反應軸的 Q 矩陣。再以每家庭內的家人為單位，計算每個家庭的 Q 因素分析，因素界定為一個因素，因素總負荷量代表這個家庭的聚合程度，而每個家人的因素負荷量則代表每個家人對這個家聚合程度的貢獻多少。而隨著兩個時間點的測量，描繪出家庭動力的變化。

1. A 家庭一家庭結構的變化

以下則以 A 家庭為例於表 8 中紀錄了這個家庭在先後兩次測量的 Q 因素總負荷量，及個別家人的因素負荷量。

表 8 家庭內之 Q 因素負荷量與變異量

家庭別	家人	Q 因素負荷量	備註	Q 因素變異量	備註
A 家庭	A 第一次	.599	有意識地抵抗母聯盟	54.351	母聯長女的單親家庭 母女當家
	A 媽媽第一次	.812	母聯盟		
	A 妹妹第一次	.783			
	A 第二次	.811	解聯盟	56.658	
	A 媽媽第二次	.768			
	A 妹妹第二次	.672			

A 為大四女生，小學時父母先分居一段時間後離婚。A 先與父親住一段時間，因母親認為父親疏於照顧而帶回家同住。幼時 A 受父親寵愛，父女感情原來不錯。母親帶著姐妹兩人，共組單親家庭，父親仍在經濟上承擔父職，母親進修碩士，並於高中任教，經濟上穩定。生活上，A 自然地「滑入」了父職的照顧角色。母親在理智上了解應該不要依賴姐妹兩人，也深恐離婚會對她們兩人造成傷害；然而實際行為上，母親會要求 A 的親職分擔而不自覺。身為長女的 A 會檢下母親的期望，並要求妹妹一起承擔。但卻又感覺受限而不甘心。對父親會以「反抗」的形式出現；對母親會以「責罵」的方式，但卻又陷於照顧她的角色中而矛盾放不下。第一次做家庭測量的訪問時，A 自覺母親限制了她的自由，使她處於下意識抵抗母親聯盟壓力的處境中，導致 A 在第一次測量時的 Q 因素負荷量較低。隨後，在對母親的訪問中，母親也自覺到這個問題，而且也反思到其在原生家庭中的排行位置，可能導致於一直是被照顧的角色。

A：「我會管我妹，像前幾天我妹有一天晚回來，我媽很生氣，我就去問我妹。後來，她還要出去，去問我媽，我媽說，只要我同意，她就可以出去了。只是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我決定？」

母：「兩個女兒在我的生活中，應該是佔全部的位置吧。所以我覺得也許她們會有她們的壓力。但其實我覺得我好像也蠻堅強的，或許該說是互相依賴吧！她們都會感覺到說，因為媽媽一個人在家裡，不放心，所以不能出去。我有趕她（大女兒）出去，因為我發現她出去，可以玩得很開心，她開心就很好，其實不用擔心我，我常常跟她講妳不用擔心我。」

「我大女兒比較機靈，她在外面我比較不擔心，可是她妹妹，我就會很擔心，會要求她，晚一點就要打電話回來，過了十點半，我會主動找她，她會覺得我蠻緊張的。」

「我覺得這樣會給她們壓力，她們會覺得媽媽在家裡的一天，就該回來。我覺得我不要給她們這種壓力，希望她（大女兒）開始工作搬出去，住在附近也沒關係啊！…我覺得我慢慢地要想辦法解套，大概再四年我就會退休，退休後我會更多時間，那個時候我不能待在家裡這個樣子…」

第一次進行訪談的結果有摘要回饋給 A 及母親，三個月後再進行第二次訪談，此時 A 與母親正努力面對 A 想出國進修的決定，A 放心不下母親的眼睛問題，而母親亦努力安排其退休生活及眼睛的照護計劃，使 A 放心。「我覺得她們現在比較敞開，敞開以後我對她們就比較沒有那麼沈重，我也不希望說爸媽的婚姻變成孩子一個說不出口的罪惡感，這樣子對她們不公平。我覺得將來孩

子婚姻好好的，一定會很快樂，對不對？而且我覺得當媽媽的唯一可以去享受的，就是他們的那種快樂。喔，我將來希望我自己的態度是能夠去享受，能夠做為她們的橋樑，而不是一種障礙：希望能夠在她們自組家庭後，還能夠給她們助力。」而在第二次的家庭測量上，不只 A 的 Q 因素負荷量提高了，家庭的總因素負荷量亦提高了，說明了 A 及母親雙方皆努力在相依的母女關係中保持各自成長的空間，母與長女的聯盟張力逐漸鬆解，這個家庭共同度過了長女在母女相依關係中長大的難關。於此，研究者認為 Q 因素分析法可作為描述家庭內動力演化的量性分析方法，與訪談家人的主觀性資料共同整合，從主觀及客觀的兩個角度共同探究家庭動力的變化。

2. B 家庭—經濟結構與意外的變化

表 9 家庭內之 Q 因素負荷量與變異量

家庭別	家人	Q 因素負荷量	備註	Q 因素變異量	備註
	B 第一次	-.263	以「隔離」來避免家庭衝突		
	B 媽媽第一次	.635		32.374	
	B 妹妹第一次	.678			
	B 爸爸第一次	.603			
B 家庭	B 第二次	.308	「隔離」轉為中度的連結		
	B 媽媽第二次	.745			
	B 妹妹第二次	.844		51.944	家庭的向心力逐漸提昇
	B 爸爸第二次	.697			
	B 哥哥第二次	.865	長子的積極承擔		

B 於大四時，參與研究者的親子關係研究，在焦點團體中意識到自己與家庭的疏離。

「我試圖在大學生所組成的團體中，開始聽、也開始講我的家庭，但是我說不出，也抗拒說。」

B 的父母原來是在中部地區經營個小裁縫店，父母親奔波於生計，B 形容自己的童年寂寞地自己長大，長他數歲的哥哥由於是長孫，所以跟奶奶住，小他四歲的小妹也不容易玩在一起。

小學六年級時，台灣的成衣業興盛，裁縫的技術被機器取代，B 的父親轉換跑道，到機械工廠工作，一家工廠換另外一家工廠，對於一個四十歲轉業的中年人來說，是困難的。母親則接成衣廠的代工工作，在家工作。家中的經濟開始拮据了起來，父母也常為了經濟時有爭吵。家中氣氛冷冽，B 與父親亦常有口角。B 國中二年級時，父親出了個大車禍，腦傷加上複雜性骨折，家中的經濟及冷冽的氣氛更是雪上加霜。

「父親在長期臥床之下，脾氣開始變得愈來愈差，我們開始無力接受這樣的關係，慢慢地我們開始逃離那個低氣壓的家庭，我開始有藉口盡量不回家，就不回家。」之後，父子對打的局面也常發生。

B 在後來的不斷反思與對話中，看見家中每個人都在父親車禍的「家變」後，各自在各自的位置奮鬥，如小妹的回顧：

「在醫院的那段日子，我不知道媽媽是怎麼撐過來的，也許是有我每個禮拜來回，她才有這個動力繼續下去。……在一次往返醫院的途中，剛踏出電梯門口，就聽到父親病房裡傳出來的怒罵聲及物品摔落聲，十歲的我整個呆在電梯門口前，不知該如何反應，隨後，便看到母親落寞的被趕出房門，接下來的場景就是母女倆抱頭痛哭的景象。」

在最後一次的家庭訪談時，B 回顧了他與家庭演變的過程。

「一場外在的車禍衝擊了整個家庭經濟結構，同時也改變了我們一家五口人親密關係的位置，情感無法彼此承接，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位置咬緊牙根，而我高中的一場大病更讓我刻意保持一個與家人疏離的距離，我畫地自限的一筆一筆刻劃自己的堡壘。」

「之後考上研究所的那一年，壓抑已久的情緒覺得需要有一個出口，我覺得我需要有家人的支持，我向大哥 Come out 出我對性傾向的選擇。當下我知道大哥是可以接納的。我突然鬆了口氣地覺得台北到老家的距離好像拉近了一點。」

「當我研究所快畢業時，父母親為我提供了兩萬塊錢，作為我經濟獨立的第一步，這是一個轉折的新開始，我意識到我不再用像前幾年過年時為了要偷塞紅包在父母親及妹妹的枕頭旁而頭痛不已，我可以讓自己在經濟上的壓力不用那麼害怕。」

B 家庭在 B 大哥役畢返家自行創業，B 妹妹亦隨後在家附近從事教職後，經濟逐漸穩定，而家庭的凝聚力亦隨之提昇。B 選擇在外地就業，生活中需要更多的自由與同性伴侶生活在一起，但他與家中的連結亦明顯地加強。

3. C 家庭—傳統父系家族中父親退休的變化

表 10 家庭內之 Q 因素負荷量與變異量

家庭別	家人	Q 因素負荷量	備註	Q 因素變異量	備註
C 家庭	C 第一次	.786			
	C 媽媽第一次	.677		54.259	
	C 妹妹第一次	.742			
	C 第二次	.867			
	C 媽媽第二次	.255	媽媽的撤離	55.824	
	C 妹妹第二次	.926			

C 的父親是常不在家的高階軍官，對家庭的管理亦是軍事管理。母親亦遵從父親的帶領。C 承受長男的期望，當兵前被嚴格教養，當兵後則逐漸承擔家長的責任，面對來自父親的交代與母親的抱怨。

第一次測量家庭系統量表時，C 對過去／現在的分界點是當兵前後（C 是服役後再重考的大學生）。雖自覺家庭系統有所變化，測量出的分數仍維持在「僵化／疏離」（Rigid /Disengaged）的系統分類上，但類別內的分數上仍見差異。（凝聚分數從 43→46；調適分數從 34→39）

C 媽：「我們家的問題就是家族老人家決定什麼就是什麼，很少聽小孩子的意見。」

「他們爸爸跟我們聚少離多：我在家裡帶小孩，帶了廿多年，一天過一天，也沒有什麼家庭聚會、旅遊什麼的，大部分都是以老人家為主，一休假就是回老人家那裡去。」

「我想我對家庭的照顧，大概就是他們的生活起居吧！對外的事情，我比較不像爸爸那樣見識廣，所以我只有聽的份。」

C：「我爸爸是軍人，大概一個月回來一次。雖然我們家沒有成文的家規，但是平常他耳提面命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我們也都逆來順受，不太會有反叛的想法。比如說，我爸爸很重視吃飯的時候要聚在一起，吃飯時不能講話，不能看電視，音樂全部要關掉，只有爸爸可以講話，他會要我和妹妹聊學校發生什麼事情。平常放學回家，他都會算好你什麼時候該到家，

差幾分就會被詰問。」

「很矛盾的是，我媽會跟我說，我爸爸不在家，很希望爸爸回來，但是爸爸一回來整個都變了，全家氣氛太凝重，就會很緊張，很多小事情不會錯的就出錯。只要聽說那幾天爸爸回來的話，盡量就少回家，能多晚就多晚。平常爸爸不在家時，吃完飯我們都會聊天、看電視或聽音樂，但如果爸爸在家的話，就各做各的，爸爸一個人在客廳看電視，看到睡著，媽媽在房間看，我們就回到各自的房間。」

第二次測量時，C 已畢業，C 父亦自軍中退役赴大陸工作。C 是以畢業至今這一年為分界，凝聚向度從上一次的「疏離」(Disengaged)，趨向「若離」(Separate)，調適向度則從「僵化」(Rigid) 趨向「有序」(Structured)。這次經驗到的改變似乎較強烈，測量的分數亦明顯地反映出類別的不同。

C 媽：「近來因為小孩有他們自己的天地，我自己的時間比較充裕一點，想法也在改變。我母親去年過世，再加上同學有的也過世了，我感受到人生時間實在是非常短暫，想到我年輕時候一心為家庭為小孩，很少規劃說我這一生要過怎樣的生活。…我會有『牽絆』，所謂的牽絆就是說，有些事情不見得他爸爸同意，我會有所顧慮，不能完全自主，真的不能完全自主，對我來講是個『心理障礙』。」

「我想去學餐飲、去運動、去學跳舞，也會跟朋友常常出去唱歌，因為我非常喜歡音樂，也非常喜歡唱歌。唱歌是我踏出去的第一步，因為我以前很少跟外面接觸，對外面會有不安的感覺。過去這麼多年跟外面接觸太少，現在有時間就應該多方面去看一看，比如說學電腦，就蠻受用的，可以在一個視窗裡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C 妹：「之前我上高中的時候，哥哥還沒畢業，正常時間上下學，最重要的是那時候媽媽沒有迷上電腦，回到家，媽一定是在家的，晚上哥哥也會回來，那種感覺比較像正常『家』的感覺。」

「現在，媽媽幾乎一天都坐在電腦前。據我所知，她是有幾個網友，聊天啊，寫筆記啊，轉寄文章啊，不知不覺一天就耗在電腦桌前。」

C 媽：「C 常會講說我常坐在電腦前面就掛住了。我想他大概會想說：『家，你都不理』，可是家又不是我一個人的，應該是大家共同負擔的，之前這麼多年都是我一個人在打理，再加上近來身體的不舒適、手臂的不方便，所以我就比較少做。…我總要為自己活一點吧！」

C 父退役後赴大陸工作，約三個月回台一次，比之前在軍中時更少在家，再加上 C 的畢業與就業，承擔起家中長子的角色，分擔了父親原有家長的責任，妹妹重考一年期間亦承擔起照顧家人起居（原來是母親的責任）的工作，以致母親有餘力逐步地從家中撤離，發展她自己的生活。僵化／疏離的父權家庭由於父親的「退位」，使得家庭逐漸趨向較彈性及較凝聚的發展方向。

研究討論

一、社會變遷中家庭的調適與轉化

上述的結果，說明了個人與社會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社會變遷的軌跡亦反映在家庭關係衝突的種種議題之中。個人在這改變的歷程中，正經歷著解構與再建構的變化，透過家人間的互動與協商，角色得以重新創造，家庭體制得以重新修改，家庭關係的結構亦得以改變。

從量性研究結果來看，同一家庭內的不同家人間對其家庭系統的知覺是有差異的。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們對家庭系統的知覺與母親及與手足的知覺有較高的關聯，與父親的知覺則無關聯，倒是與父親的差距對青少年的家庭系統知覺呈現負面的關聯。這可能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方式有關，父親常是面貌不清楚的遙遠養家者。相對的，與手足及與母親之間則較傾向一致，尤其是手足系統，無論在凝聚向度或調適向度均呈現正面的關聯作用。此與西方的家庭治療及研究過度強調父—母系統，而忽略手足系統有所不同。整體而言，家庭共識與青少年的家庭知覺呈現中度的正關聯，而家庭差異則呈現中度的負相關，另外，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們只有1/3自覺到其家庭系統會因時間而有所變化，而自覺變化的樣本中對過去家庭知覺及現在的家庭知覺亦呈現高度的相關性，這些或說明了他們看待家庭雖有些小變化，但卻主要是有連續性的。上述結果反映出家庭連續性及家庭共識對青少年的家庭知覺是重要的。

從質性研究的結果來看，三個家庭分別面對不同的環境變化，A 家庭面對父母離婚後家庭結構的變化，母女間情感聯盟的轉化是其調適的重點。B 家庭則經歷了家庭經濟結構的變化、產業變化及意外的車禍改變了家人間的情感連結，隨著子女的就業，經濟逐漸穩定，家人間的情感連結也逐漸加強。C 家庭面對的則是傳統父權家庭，隨著父親的「退位」，使得家庭逐步趨向彈性與連結。

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看來，個體的改變與社會是雙向互動的過程。Strauss (1978) 更進一步提出「協商層次」(negotiated order) 的理論架構說明「意義」是如何從微觀層次 (micro-level) 的概念到巨觀層次 (macro-level) 的概念中互動，其中依序分為自我認定 (identities)，角色 (roles)，互動 (interactions)，與背景 (contexts) 四層概念。Strauss 提出的「協商層次取向」(the negotiated order approach)，即進一步在描述這種個體與社會的聯結。協商活動指的是個體在協商互動中所呈現的活動，如談判，妥協等行動本身，協商脈絡指的是協商情境的脈絡，如互動雙方的關係特色與情境的特色等。結構脈絡指的是大環境中對協商情境產生直接影響的社會文化脈絡。因此，任何家庭關係中的共識或契約，都是一連串協商互動下的產物，所反映出的不只是協商活動本身，還深受協商脈絡與結構脈絡的影響。家庭的調適與轉化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比如 Chirhart (2003) 的研究指出在 Georgia 的非裔的美國女性教師生涯始於 1930 年。從她們的故事中，反映出 1. 黑人家庭致力於讓她們的女兒赴外地受教育，成為教師，而她們的朋友或親屬也都願意照顧這些在外地讀書的孩子。這些都形成了黑人家庭中自二次大戰後，面對其經濟及社會壓迫下的一種成就。更說明了黑人家庭與社區或親屬關係緊密，形成共同體及文化，來完成家庭的任務。當然，在其中的婦女所認同的性別角色也是與社區緊密相連的。這種廣義的生態觀點能更貼切地貼到家庭真實，而避免狹隘家庭系統理論中對於性別、階層、及文化等特殊處境的偏見與迷思。

二、直線的網與動力的水

綜合上述，本研究嘗試從客觀家庭系統測量及家人的主觀詮釋角度探究家人間是怎麼樣看待「家庭」這個單位，而「家庭」又是怎麼在面對大環境的危機與挑戰。然而，客觀的網撈不全質性的水，回應先前對「環繞理論」及其測量的批判討論，文化的敏感，性別與階級的敏感都是被期待能更加強的部分。本研究在測量上，將「父」與「母」分開，而不是籠統地以「父母」處理，即希望能呈現家庭內的性別現象。同時，對家中不同家人施測即想補足家中不同系統的反應。另外，在背景變項，以性別、居住地、社經等背景，亦希望能儘量反映家庭系統測量的脈絡差異。

雖然如此處理，的確也呈現出些微的差異型態，但似乎不盡理想，原因諸如長期要蒐集不同家人的反應，就是不容易的事，導致研究樣本人數不如理想，另外，研究者認為將這些脈絡性的現象窄化成簡單的類別變項，就很難反應成量化的相關數字，這或許就是量性研究的限制，反倒是在家庭訪問的敘事資料中能清晰地看到性別、社經、家庭結構等脈絡對家庭互動的影響，如在 A 的家庭，敘事中就可反映出前述之脈絡對家庭互動的影響。另外，量性統計背後的直線假定也使得原先環繞理論中「過猶不及」的曲線關係不易呈現，而所謂「二級改變」的統整歷程更是無法由量性的方法測量得知，但卻可以透過前後幾次的家庭敘事中看到家庭的調適與統整歷程（限於篇幅，此部分的資料將另文發表）。整體而言，家庭系統的量性測量或許可以對家庭系統作結構的簡化分類，但在功能及動力的變化上，質性的家庭敘事探究方式，將更能貼切的描述與分析。而 Q 因素分析的方法算是用來捕捉複雜家庭動力的一種簡單測量動力變化的量化工具，結合量性與質性的資料。

關於上述對家庭系統的量性與質性探究方式的看法亦與國內學者黃宗堅（1999）的探究觀點雷同。黃宗堅在其評估家庭系統的測量工具之後，提出在測量或觀察家庭特性的變項時，研究者恐怕不是擔心該聽誰所提供的資料，或是急於算出一個家庭功能的平均分數（mean score）或最佳分數（maximized score），而應是去關心成員份子或外來觀察者對家庭關係的知覺歷程有哪些不同（what），為什麼不同（why），而這個不同又如何影響家庭成員間的相互發展（how）。同樣的研究探究，在孫頌賢與修慧蘭（2002）的研究結果中亦發現，在測量對象上，不同成員間的差異的確存在，故測量對象應包含父、母、子三者甚至更多，所獲得的資料亦更接近系統性，同時，在家庭系統分析方法上，不同成員間觀點之差異性確實存在的，而不適合使用「平均數法」與「差異數法」處理系統資料。本研究結果亦當是呼應上述觀點之實徵研究成果之一。

三、家庭調適的不同探究

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個歷程，家庭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時間演化而轉進的，而且經常也是多重系統，甚至是多代系統同時隨著時間共同交織成的演化歷程。但是，如何透過「研究」呈現此動態的複雜歷程，卻是個頗具挑戰性的難題。傳統心理學的邏輯實徵研究典範強調客觀、量化、直線因果等標準，使得研究取向較難面對「非直線」的家庭互動；相對的，實務工作者面對的則是問題能否有效改變，認為系統論有助於互動形態的深層改變，但亦難採取多重系統的家庭演化觀點，以美國結構派家族治療工作者米紐慶（Minuchin）（Minuchin & Nichols, 1992/2000）而言，在回顧他對家庭功能與發展的看法時，亦清楚看到他早期如何視「家庭」為單一系統的有機體，而且是保守、抗拒改變的，必須仰賴家族治療者的介入以引發調適性的改變。

然而，在九〇年代的米紐慶，由於學術典範的多元，在實務介入的觀點上做了很大的轉變。「除了繼續保留家庭結構和家庭發展的概念之外，我開始專注在家庭所編造，可以用來了解其生活情形的特殊故事。根據記憶所說出來的『故事真實』（reality）比『歷史真實』更具影響力。『事實』對治療師而言，有一部份是歷史真實，有一部份是編構出來的（故事真實）。編構的內容成為家庭中共通的現實，這種情形代表相互的了解及共有的偏見，其中有些會帶來希望和助益，有些則不盡然。」（p78）

「於是我從技巧的教導者轉變到教導如何思考家庭及其互動的方式，當家庭前來尋求我的協助時，我的假設是，他們不是因為本身有什麼毛病，而是因為他們被困在死胡同一困在一個個時光不斷流逝的結構，困在一個沒有發生效用的故事裡。」（p79）

從「技術」的介入，到「系統」的植入，到「家庭故事」的重新理解，米紐慶將家庭調適的動能與主體從治療師手上還給家庭，不過無論過去與現在，他都看見家庭是在行動中的，非靜態停滯，等待切割解剖的。米紐慶將家庭調適的動能交還給家庭，就如同 Pinosof (1992) 所說的，家庭系統是由許多不同層次的次系統互相影響而形成的複雜系統，家中每個人都在詮釋著他的家庭，而不同人眼中的家庭就是不一樣，而這「不一樣」也往往是動能的來源，我們低估了「差異」的動能性。不拘泥於線性切割的研究典範，呈現家中不同人多聲帶的詮釋差異，讓家人更看清每個人不同的位子，也更能貼近家庭內的動態真實，環境中的性別、階層位差的看見，更能理解家庭內／外的對流狀態，就如同從流體力學的角度看，「位差」常是動力的來源。家庭自有其自發性的調適歷程，這也是本文最初的關注。未來在家庭調適的探索上，建議能採取「家庭生命史」的研究觀點，視家庭為大型社會脈絡中的小型社會團體，交織著因社會脈絡中時空變遷而共享的家庭經驗與意義。

參考文獻

- 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 (1991)：關係取向：為中國社會心理方法論求答案。載於楊國樞、黃光國 (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 (49-66)。台北：桂冠。
- 孫頌賢、修慧蘭 (2002)：已家庭系統觀進行家庭系統測量之研究—以家庭系統分化為例。中華輔導學報，11，125-166。
- 高達觀 (1978)：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台北：九思。
- 黃宗堅 (1999)：家庭系統的測量與應用。應用心理研究，2，83-110。
- 楊中芳 (1991)：回顧港台「自我」研究：反省與展望。載於楊中芳、高尚仁 (主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15-92)。台北：遠流。
- 劉惠琴 (2007)：家庭系統測量的評估—以晚期青少年的家庭為例。中華心理衛生期刊，20 (3)，261-290。
- 劉瓊瑛、黃漢耀、魯宓、馬英譯 (2000)：回家—結構派大師說家庭治療的故事。台北：張老師。
- Minuchin, S., & Nichols, M. P. (1992). *Family healing: Tales of hope and renewal from family therap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Bartle-Haring, S., Kenny, D. A., & Gavazzi, S. M. (1999).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family differentiation: Analyses by multitrait multimethod matrix and triadic social relations model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2), 491-503.
- Brown, S. R. (1993). A primer on Q methodology. *Operant Subjectivity*, 16, 91-138.
- Chirhart, A. S. (2003). "Better for us than it was for her":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reform in modern Georgia.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8, 578-612.
- Kazak, A. E. (1992). Stress, change, and familie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6(2), 120-124.

- Lee, C. (1988). Theories of family adaptability: Toward a synthesis of Olson's circumplex and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s. *Family Process, 27*, 73-85.
- Markman, H. J. (1992). Marital and family psychology: Burning issu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5*(384), 264-275.
- Melito, R. (1985). Adaptation in family system: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Family Process, 24*, 89-100.
- Olson, D. H., Sprenkle, D. H., & Russell, C. S. (1979).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I.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dimensions, family typ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Family Process, 18*(1), 3-28.
- Olson, D. H., McCubbin, H. I., Barnes, H., Larsen, A., Muxen, M., & Wilson, M. (1992). *Family Inventories*. Minneapolis, MN: Life Innovations.
- Olson, D. H. (1999).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Retrieved July 22, 2008, from <http://www.lifeinnovations.com/pdf/circumplex.pdf>
- Olson, D. H., & Gorall, D. M. (2006). *FACE IV and the circumplex model*. Retrieved July 22, 2008, from <http://www.facesiv.com/pdf/3.innovations.pdf>
- Pinsof, W. M. (1992). Toward a scientific paradigm for family psychology: The integrative process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5*(4), 432-447.
- Sprenkle, D., & Olson, D. (1978).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systems IV: Empirical study of clinic and non-clinic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ing, 4*, 59-74.
- Strauss, A. (1978). *Negotiations: Varieties, contexts, processes, and social order*.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Bass.
- Widdershoven, G. A. M. (1994).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H. A. Bosma, T. L. G., Graafsma, H. D. Grotevant, & D. J. Levita (Eds.),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pp. 103-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收稿日期：2007年04月13日

一稿修訂日期：2007年08月09日

二稿修訂日期：2007年10月09日

三稿修訂日期：2008年07月31日

四稿修訂日期：2009年11月27日

五稿修訂日期：2010年01月13日

六稿修訂日期：2010年01月20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0年01月20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1, 42(4), 567-590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The Dialogue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Family Adjustment

Whei-Ching Liu

Psychology Department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study us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adjustment of youths and the families as they confront challenges from societal change. Research sample focused on late-adolescent families. Data were collected in three phases: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surveys in the first phase; data from past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used in the second phase; and data from volunteers recruited for family interview in focus groups were used in the third phase.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reported: 1. Consensus and discrepancies of family system percept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 2. Continuity and changes of family system perceptions. 3. Changes of family dynamics using Q-factor analysis. 4.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of the content, understanding, and intent of the behavioral adjustment among family member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family system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mothers' and siblings' perceptions but not correlated with fathers' perceptions. Qualitative data from three families were used to illustrate how the family system adjusted and adapted to societal changes. Finall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systems and dynamic family processe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family adjustment, family system